

第五章 結論

隋唐之前，關公的崇拜只是一種區域性、非官方的崇拜。關公信仰開始的緣起是因其擁有身爲一武將所具備的勇武精神。死後，荊州地區的民眾初期爲求避禍開始奉祀關羽，後來漸將關羽視爲守護神，而形成荊州地區的民間信仰。唐代，關羽因忠勇的人格爲官方所認可，正式列入武成王廟陪祀的六十四名將之一，開始邁向正神的行列。佛教也於此時，將關羽神化爲護法伽藍加以利用，以提高佛門的地位。宋代，儒學復興及國勢的不振，政府希望能尋得一理想典範來激勵效忠，關羽因此雀屏中選獲得皇室與儒士的青睞，開始接受帝王的加封，關公信仰已然成形。加上道教高規格的祭祀禮儀，關公的神格大爲提升。明代初期，關羽地位稍受影響，但隨著亂事頻仍，皇帝急欲尋求神助，關公重新登上神界的舞台並逐漸成爲重要角色之一，甚且享有「帝」的封號。清代更將關羽崇奉推至最高點，已無人能取代。

在一波波官方的追贈加封中，民間開始流傳的通俗文化作品，說書、戲劇、小說等也多以三國故事情節爲內涵，廣向普羅大眾傳播，尤其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更爲市井小民、販夫走卒所欣賞，關羽英勇、忠義的形象也隨此散播至一般民間百姓心中，關公的神格透過這一步步的互相串聯正式奠定了基礎。

關公所具有的「忠義神勇」人格特質，令官方大肆建廟、確立祭儀來加以提倡，祈求藉神力護國並使百姓以爲仿效。一般民間對關公的尊崇，也多透過建廟宇奉祀或私設神像在家膜拜。隨信奉的對象增加，其神格及扮演的職能在不同祈求對象的經營下也不斷擴張。經商的商人、商店奉其爲行業神；民間百姓爲求財，奉其爲武財神；軍人、游民及秘密團體，則視其爲保護神。隨著一波波崇拜的擴散，各種關公顯聖的神蹟不斷出現，更透過以關帝爲名的善書傳播，加深其在廣大民間的信服力，關帝的崇拜經此正式達到登峰造極的境界。

從鄭氏政權取得台灣爲根據地後，隨著移民大量入臺攜來香火、軍人的私下建廟奉祀及官方在台灣移植朱明的所有規制，關帝信仰也跟著進入台灣。尤其閩臺間的關係更是密切，今日台灣大多數關帝廟在大陸的祖廟有二，一爲漳州東山

銅陵縣的關帝廟，另一為泉州通淮的關岳廟。

鄭氏時期全台興建的關帝廟有九座之多，已超越明朝的守護神玄天上帝。清代收台灣入版圖之後，對關帝的崇敬更是前所未及。除要求各省府州縣廳治均要設置武廟外，並頒布中央及地方標準化的祭儀，咸豐年間更提高祭祀的層級到中祀。台灣地區的關帝廟也在此背景下愈來愈多，由南到北陸續建立，且祭祀規模隆重。經過鄭清時期的發展，關帝信仰已在台灣奠定其相當的基礎與規模。

日治時期，初期為避免臺民反彈，日人的宗教政策是採不干涉的態度。西來庵事件後，日人開始積極調查各宗教，並逐漸企圖干涉台灣宗教的發展，尤以中日戰爭爆發後的「寺廟整理運動」，造成的傷害最大。政治力的介入干涉宗教，使得各地的關帝廟多少受到一些破壞，整個日治時期的發展比起以前顯然是較緩慢的。戰後初期，百廢待興，至民國四十年代止，全臺關帝廟的發展，主要是以原有廟宇的修建為主。五十年代開始，宗教信仰自由的恢復及經濟活動的開始蓬勃發展，關帝廟的設置始終保持著一定的增加速度。

台南市關帝信仰的發展過程，與台灣地區整體的狀況是大致一致的，可分為二個階段來加以觀察。第一階段鄭清時期，是關帝信仰發展進入府城地區，並開始奠基的階段。移民來台，多會帶著在原鄉所奉祀的神明香火以求庇祐，關帝在大陸已是全國性的神祇，一般民間早已普遍敬祀。來臺戍守的兵丁在駐軍地，也多會私下建廟奉祀，甚至武官也會興修關帝廟來崇奉。加上關聖帝君有利於政權鞏固，為官方所重視被列為國家祀典。府城為當時鄭清政權的政治中心，又為官員和士兵集中之所，從鄭經開始早就建有關帝廳供官員共同崇拜，後來清朝更於各府州縣廳治設武廟加以定時祭祀。因此，當時府城各區幾乎都有關帝廟，不管是官方或民間，對這些寺廟的維護是相當用心。嘉慶朝後，府城商業機能日趨強盛，各式關帝廟的維持與崇奉中，民間參與日多逐漸扮演主要角色。第二個階段日治及戰後時期，最大特徵是清廷官方和士兵撤出台灣，官祀和軍祀活動停止，關帝轉成主要由民間奉祀的全方位神祇。雖然信仰一度因日人的相關政策受到影響，甚至停滯，但也因此使得關聖帝君得以從前一階段清廷所重視的政教神格脫離出來，轉成以守護民間、庇祐商業和勸善行道為主要職能的神祇。也因透過

這些新面貌的展現，關帝信仰又增添其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從這些關帝廟的設置，可以看出台南市歷經鄭氏、清代、日治到戰後的關帝信仰發展過程。與市區的開發經過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鄭氏階段的拓展僅止於赤崁承天府及安平鎮，最早的關帝廟也建立於此處。清代府城出現，至清末為止，除安平地區外，開發限於城內及城外五條港區，新增建的關帝廟也在這些區域出現。日治時期，城牆拆除，市區外拓。戰後，台南市轄區更明確擴增至安南區。人口往新開發區發展時，關帝廟也隨之出現。

台南市歷年來所興建的關帝廟中，因崇奉者的差異，促使各種類型的關帝信仰在府城均得一窺見。有專供官員祭拜奉祀的官祀武廟；有軍人奉為保護神的軍祀關帝廟；有一般民間信眾奉祀的民祀關帝廟；而到清代後期日治階段，才又出現的以勸善行道為宗旨的鸞堂關恩主崇拜等。這些的關帝崇拜類型，充分顯示出關帝信仰與其他神祇不同的特殊性。

早期台灣的移民社會中，社群雖有血緣、地緣、業緣等不同的組織原則，但幾乎一致地，每個社群通常均會以神明作為祀護和凝聚成員的手段。當社群財力有相當發展後，常建立其專屬的祠廟以奉祀其守護神。台南市民祀與軍祀的關帝廟大率皆屬此類。官祀武廟的建立，則是反映統治者以神道設教的心態。世俗政府早已意識到，超現實的觀念和相應的宗教實踐，會有利於政府獲得民眾對其權力和制度的接受。但也有可能被其他組織用來發展一種具有競爭性的權力中心，所以，傳統政府總是千方百計的對超自然力量進行控制，壟斷宗教儀式和對宗教事務的解釋。清代台灣官方特重武廟崇祀，原因即在此。鸞堂自清末以來，便藉由宣講、著作鸞書、慈善、濟世等活動進行儒家教化的工作。鸞堂的主事者及成員大抵自視為儒教中人，其主要宗教儀式為扶鸞，藉此進行天人溝通。一方面託言天命，著作鸞書，勸善行道；另一方面也解決生民在俗世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關帝為鸞堂中最重要之恩主公，鸞堂因得反映關帝信仰的不同內涵。

上述不同的關帝信仰類型各有其特殊性。對關聖帝君崇拜的日常祭典，或特殊建醮活動的進行，各類型信仰都同樣重視。雖然時代的變化，在祭典日期上會有一些出入，但相關的慶祝活動都一樣隆重。而信徒的組成，官祀與軍祀信仰在

原有信徒流散後，也逐漸轉型與民祀信仰有相同的信徒組成，但香火不如民祀信仰鼎盛。鸞堂則性質特殊，較明確的信徒，為實際參與堂務的堂生。至於廟務的管理與祭祀活動的進行，官祀與民祀信仰近年來的做法較為積極，常透過大活動的舉辦，來增加廟宇的知名度。軍祀信仰則顯然已趨沒落，為目前信徒中較少的。鸞堂內，堂主仍為重要事務的決策者。各類型信仰所具備的宗教、教化、娛樂、經濟、社會救助等多方面功能，雖然因時代轉變有不同的發展及消長，但對整體社會的穩定有相當幫助。

